



南方，南方！

一部南方广播电视传媒的生态志
一种文化风格和文化现象的解读

徐南铁 陈桥生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南方，南方！

一部南方广播电视传媒的生态志
一种文化风格和文化现象的解读

徐南铁 陈桥生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方, 南方! / 徐南铁, 陈桥生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60-6662-5

I. ①南… II. ①徐… ②陈…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3223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杜小烨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傅锦文
版式设计: 潘英伟
封面摄影: 杨和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7.5 3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章 直面香港冲击波	1
第一节 兵临城下	2
第二节 全方位冲击	11
第三节 艰难的对抗	21
第二章 寻找突破口	31
第一节 时代的呼唤	32
第二节 2000：全省一张网	37
第三节 2001：南方台横空出世	43
第四节 2002：打造联合舰队	49
第五节 2003：艰难的谈判	53
第三章 一个新模式的诞生	61
第一节 寻找他山之石	62
第二节 南方的定位	70
第三节 这一方水土的灵气	76
第四节 沙场点兵	80
第四章 南方的雄心	89
第一节 澎湃的活力	90
第二节 乱花渐欲迷人眼	98
第三节 南方盛典和新丝路	109
第四节 总统十字勋章	125
第五章 南方的内涵	139
第一节 改革中的实力展现	140

第二节 在历史的基座上起飞	148
第三节 珠江模式	160
第四节 流行音乐与歌榜	172
第六章 开辟“农村根据地”	181
第一节 管好三七二十一	182
第二节 在云浮起步	186
第三节 局长终于抬起了头	192
第四节 清远的故事	196
第五节 走向粤东	201
第六节 协奏一曲春之声	206
第七章 南方的天空	211
第一节 民生新闻的胜利	212
第二节 电视短剧的翻身仗	219
第三节 对手和朋友	232
第八章 延伸的理想	243
第一节 南方之路	244
第二节 广东气派	254
第三节 岭南处处皆春色	263
后记	275

第一章 直面香港冲击波

第一节 兵临城下

珠江日夜奔流。

它没有长江三峡那样的险峻，也没有黄河壶口那样的跌宕。它的水量丰沛，水势平缓，似乎象征着南国的沉稳和低调。当我们习惯于高歌大江东去的时候，它却偏偏向南而去，带着亚热带的泥土芳香流入南海。

在珠江的入海口，有两颗我们失而复得的明珠——香港和澳门。百余年间，围绕着这两颗明珠风起云涌，传诵着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谱写了中国历史的多少壮丽篇章。

所有的故事都与广东息息相关；所有的篇章都闪耀着广东的身影。

当历史的大书翻到 20 世纪末叶，毗邻港澳的广东占据了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挖掘的“第一桶金”就得益于港澳。

但是同样的地缘优势对于文化，特别是对于广电事业的发展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回望过往，广东广电人有着太多酸甜苦辣的记忆。所有的迷惘、困惑，所有的挣扎、奋起，都与境外媒体的冲击与挑战息息相关。如果将这些冲击与挑战更集中地聚焦到一个点上，那就是香港的广播电视。

与内地不同，广东广电的发展可以说是被香港的广播电视“逼”出来的，它前进的每一步，几乎都深深留下了这种“逼”的印记……

广东是中国对境外电子传媒开放的唯一省

份。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的广播电视节目早就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风行。只不过那种越境毕竟不是堂而皇之。

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的电台节目已经在广东悄然落地，强势涌入广东人的耳朵，悄然叩响广东人的心扉。

1990年以后，广东省不少地区的百姓已经可以公然通过省有线台和各地市的有线网络，收看香港电视节目。

因为两地持同一种语言，更因为节目内容的丰富活泼，或者也因为猎奇心理的驱使，广东本地观众很快就接受了香港电视。在那个历史阶段，香港的“无线”（TVB）和“亚视”（ATV）在广东省各地稳稳占据着收视份额的前两把交椅，强力抑制着广东电视节目的收视率。

据1999年在广州市的调查，香港电视的收视率达到72.5%，而我们集中央及省、市三级电视之力，方才达到27.5%！

一个是72.5，一个是27.5，连数据本身都似乎在刻意地彰显一种颠倒，一种对峙，甚至一种嘲弄。难道这真是冥冥中一种无形的历史宿命？

广电的收视率是一个你消我长的关系，一个份额占得大，必然就挤压了另一个。所以，广东与境外媒体的较量无可避免。

这种较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曾经以文化娱乐及政治色彩的渗透、影响为主，

后来演变为经济元素的对撼。

最早的较量在电台之间，两地的广播节目相互争夺老百姓的耳朵。

广东毗邻香港，珠三角沿海地区普通的收音机都能收听到香港的商业电台，而语言的相通更是拉近了广东老百姓与香港电台的感情距离。何况，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有着几分神秘。

一开始，我们的对撼手段是本能的抵制。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把境外的广播视为“敌台”，视为靡靡之音，是颓废、迷幻的传播者，甚至是引导邪路的手段。那个年代，我们在图书和银幕上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夜深人静，坏人躲在阁楼上偷偷打开了收音机，“敌台”矫揉造作的声音在夜色中畏畏缩缩地蔓延……

为了抵御香港电台的播音，守住空中的防线，在广东电台的大楼顶上，设置了一个很小的接收台，称为707台，专门收测香港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境外电台的播音，然后马上通知设于广州海珠区的808台进行干扰。808台名义上是科学试验台，实际上是干扰台，按境外电台相同的频率不断发射电波，干扰其进入我境内。

为了阻止老百姓收听境外广播，“文革”时期还专门设有“偷听敌台”这样一项惩治条例。

我们曾经有一个悲壮的口号：守土有责！

但是，要筑起一道空中的防线谈何容易，其艰难实不亚于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尤其是在深圳、珠海等紧邻香港的地区，要干扰来自彼岸的电波信号更是力不从心。

进攻的步步紧逼；防守的不断退却。邓丽君的来到就是一个例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丽君猛然在中国大地走红，掀起了一股热潮。但是至今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究竟是怎么涌进来的，又是怎么开始回旋、荡漾的，谁是始作俑者，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开头，当然是偷偷地听。但说是偷听吧，又不像“偷听敌台”那样严重，听则听矣，喜则喜矣，虽然不那么合法，却又似乎无大碍。

据说，有一位广东广电厅厅长，至今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一幕：有一天他去省委开会，一上车，司机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选的是香港的广播节目。路过街道居民宿舍，他见一群人围坐在一起，香港广播的声音从他们那里传来。而当他开会回来进入广电厅的大院时，发现传达室里正开着收音机，收听的也是香港的广播。

作为广电厅厅长，我们不难揣测，他的心里十分不平静，甚至充满了感伤。他为自己主管下的广播节目没人听而愧疚和烦恼。

当人们手中的收音机换成客厅里的电视机后，同样的尴尬困境就移植到了电视屏幕上。

那时候，内地刚刚摆脱十年浩劫，刚刚打

开国门，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依然比较贫乏和单调，而香港的电视节目乃至广告中，因为宣扬着西方现代生活和娱乐的内容，令人耳目一新。比起广播的听觉冲击，电视更增添了视觉的直接冲击，对观众无疑具有更大的新鲜感和诱惑力。

风景那边独好。香港的广播电视就像一个娇俏迷人的时髦女郎，以其婀娜的身段、甜美的嗓音，花枝招展地蛊惑着、迷蒙着人们的耳目，在水一方，媚不可当。因此，许多老百姓家庭都将香港的电视节目作为调台的首选。

历史不会责怪娱乐饥渴中的老百姓。精神食粮也如物质需要，饥不择食。当供不应求的时候，每一点东西都那么珍贵。

广东的老百姓当时对香港电视欢迎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的人们听起来大概要以为是天方夜谭了。

那时候，人们都把看香港电视节目视为一种高档的文化享受。那年月的深圳，除了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受到全国的关注之外，还因为能够收看香港电视而被人艳羡。

陪客人看香港电视，竟然成为深圳人最好的待客之道。每逢家里有客人来，吃完晚饭就请他看香港电视。主人和客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并议论着屏幕中那个新奇的花花世界，惊奇着，羡慕着，不亦乐乎。

那些收看不了香港电视节目的地方，如韶

关、清远等边远山区，人们时不时就要设法去深圳一趟，目的很简单，就是看几天香港的电视节目，开开眼界。

记得笔者第一次去深圳出差的情形——在深圳大学的宾馆里，电视机整晚都不得空闲，总在几个香港台的频道之间交换。半夜过后，恐怕连香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都犯困了，开始敷衍性地播映粤语残片，大家这才上床睡觉，但是舍不得关上电视机，生怕等会又有什么新鲜节目出来。

正因为如此，“看香港电视”甚至成为广东许多宾馆酒店的号召力。

有一次，广东某迎宾馆贴出了一张告示，很是遗憾地通知住客：对不起，明天某某领导要住在咱们宾馆，三天内不能播放香港电视，请各位谅解……

领导来了，香港电视不能放了。从宾馆这种无奈的歉意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情景，深深体会到香港电视曾经有过的巨大感召力。当然同时也可以知道，那时的领导是不让看香港电视节目的。

在这样的热潮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得天独厚”真是令人艳羡。在深圳、珠海、中山、江门、东莞、顺德、南海、番禺、广州、佛山等地，居民们只要拥有全频道电视接收机和定向接收天线，就能清晰地收看到香港的“无线”和“亚视”四个电视频道。

那时候，定向接收天线成为百姓家居不可

或缺的新宠。在珠三角城乡的高楼或平房上，民间以形状命名的所谓“鱼骨天线”，高高低低、密密麻麻，架设得如同丛林，而天线的方向却是一致的——直指香港，成为时代的一大奇观。

如果有高大建筑物的阻碍，或者遇到不好的天气，收视效果就会受到影响。这时候，收看者并无怨言，他们会爬上屋顶去，拨弄拨弄天线的朝向，以求得更好的效果。这就像人们在收听境外广播，遇到“沙沙沙”的噪声越来越大时，总会习惯性地吧收音机变换变换方位。

于是历史为广东人家留下了这样的一种场景：

一家人有一个——大多是男人——爬上了屋顶，一边移动、调节着自家竖立的鱼骨天线，一边大声问屋里：“行了吗？”屋里的女人和孩子急切地盯着电视屏幕，一会说“行了”，一会又说“还不行”。

笔者曾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一个征文活动中担任评委，征文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与我的生活”。有一个作者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买了一台彩电，带室外天线，通过天线才能收到台。为了多收几个台，天线总是摆在最高处，连屋后的柚子树也不放过。负责这个任务的是老哥，我负责在下面当‘汇报员’。于是‘好了吗？’、‘没有’、‘再摆一下’的对白在屋前屋后回荡，成为家常便饭。有时刮风天线摇晃要拿东西去定住，更糟糕的是，碰到雷雨天还得拔了天线插座，以免把电视烧

坏。当我们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真不想拔啊！”

那些年头的电视机技术参数比较低，屏幕小，收视效果也比较差。广州有些家庭将彩色的透明纸贴在屏幕上，以制造“彩电”效果；有的还在屏幕前设置一块放大镜片，让图像“增大”。广东人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锲而不舍地追寻着香港的电视节目。

在珠江三角洲，连公社书记、县委书记都对观看香港电视节目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他们中有人为此找出一个极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每逢台风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登陆，香港电视都是24小时跟踪播报，观众可以随时知道台风的动向。而我们的电视一是消息来得慢，二是每天晚上十一二点钟就没有消息播送了，用农民的语言说：早早给观众们吹响了“晚安”、“再会”的“收工哨子”。

这些基层的领导干部说：我们要指挥抢险救灾，没有准确的预报怎么行？所以一定要看香港电视。

这应该算得上一条很好的理由。当然，他们还应该有更多的理由，只是没有或者不便于说出来。

就是在老百姓这样的支持下，香港的电视节目终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进入了广东。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面，当时有关管理部门组织过多次大规模查禁，并且提出，要把此项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抓。

省委书记也曾亲自出面，把珠江三角洲的县委书记们都召集起来开会，要求一定要把鱼骨天线收起来。

每到党的生日或者国庆的前夕，更是把重申拆除鱼骨天线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在七一或十一之前拆除，为的是营造良好的氛围，向这些重要节日献礼。

但是，打开了的天窗如何能再堵上？

老百姓不愿意放弃瞭望外部世界的窗口，不愿放弃已经难以割舍的精神“享受”。鱼骨天线刚刚被迫拆了，转眼又偷偷竖了起来。

建了拆，拆了建，拆建之争甚至演化成影响干群关系的社会老大难问题。

有一年，东莞县曾由一位副书记带队，组织了公安、工商、广播等七大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队，到农村落实拆除鱼骨天线的工作——就像后来组织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一样。这位副书记在大会上放言：“如果七一前东莞的鱼骨天线不消灭，我这个共产党员就白当了，就退党！”

据当事人回忆，工作队弄得到处鸡飞狗跳，老百姓则像对待鬼子进村一样与工作队应付、周旋。

工作队的拆除结果是尴尬的。七一的晚上，东莞的家家户户依然传出香港电视的欢声笑语。

有人跟那位副书记开玩笑，问他：鱼骨天线没拆除，那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副书记无

法回答，只能尴尬地笑笑。

我们深深地理解书记们的苦衷，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他们作为一线的干部，不这样做又能如何？

珠江三角洲拆除鱼骨天线的斗争，其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体现了香港电视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

在1988年这一年，当时的一位中央高层领导来广东视察。初来乍到，关于香港电视的问题他的调子也是定得很高，强调要筑起一条阶级斗争的防线。但是在从广州去佛山的车上，他听了当时的广东省广电厅党组成员、广东电视台台长刘炽的汇报，有所感悟，调子一变，说：对香港电视不用那么紧张，香港迟早都是要回归的，允许它存在，怕什么！他还说，香港电视值得我们学习，希望广东的广电管理部门拿出一个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来。

刘炽很兴奋，还在佛山就着人把领导的讲话整理出来了。一回到广州，他就组织人写了一个改革方案，上报北京。

但是，他等来的却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要求不予下发或传达他们整理出来的那个讲话。

所谓“改革”，当然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这次改革的提出和很快的胎死腹中，说明当时即使是中央也对这个问题举棋未定。

在当时，电视主要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工具。许多人都担心，如果给境外电视

开放天空，必将在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上引发不应有的震动。

但是老百姓的要求怎么办？

历史曾经为我们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打倒“四人帮”之初，邓小平复出来到广州。广东省的领导们在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珠江三角洲的老百姓逃港现象严重，动用了武警也没有办法制止。邓小平沉吟着说，那样制止是没有用的，恐怕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毕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代伟人，看待事物洞若观火，入木三分。

在他老人家主持下，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果然不用花力气去阻止，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成为定势，逃港现象竟然就神奇般地消失了。用深圳一些人的说法是：逃港现象戛然而止。

对待香港电视，当时我们却还没有这样的胆略和气度。于是，关于鱼骨天线的拆和建的拉锯战很长一段时期在珠江三角洲不停地上演。

基层干部依然夹在上级部门和群众之间无法协调，只好回过头来骂广东省的广电管理部门：就因为你们的电视节目办得不好，弄得我们不得安宁！

虽然是无奈的发泄，却又道出了一定的道理。

上下都在骂广东的电视，广东广电人落得

两头不是人。

同样的两难态度，更直观地体现在汹涌而来的香港流行歌曲上。

那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香港的无线电视公司和广东电视台第一次牵手，制作名为《欢乐今宵》的节目。地点在广州烈士陵园。演员有的来自香港，有的是广东自己的人马。节目按照香港《欢乐今宵》的模式来操作，现场播出。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场晚会。那个晚上，风清气朗，观者如云。歌如潮，笑如潮，红男绿女如醉如痴。广州几乎是万人空巷，整座城市都轰动了，影响甚至波及了全广东。

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第一次听到那么生动的流行歌曲，大为惊奇和感慨。他们这下才知道，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唱，可以唱得这样通俗，就像平日里拉家常一样通俗。

通俗的港台歌曲从此风靡一时，一发不可收，从而对广东音乐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不小的争论。

那时候，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正因为一曲《乡恋》，在全国遭受着一场铺天盖地的批判——说那首歌是靡靡之音，说李谷一是黄色歌女。有一个“大人物”还批评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

一些批判文字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无产阶级思想应该是非常健康的，不能被这些软绵绵的东西来摧残！

李谷一后来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感慨万千，她说那段时间常常噩梦缠身难以入眠，一次次流下委屈的泪水。

在这种形势下，广东广电人竟然敢于向通俗的港台歌曲敞开自家大门，岂不是引狼入室，养虎为患？当然不免惹来反感、悲愤、警告、咒骂。

有人批评说，广东省的广电管理部门是罪魁祸首，是它为香港的流行歌曲开了第一盏绿灯。

但是，社会的需要无法阻挡，广东广电义无反顾。

社会的需求就如一江春水，总在寻找奔泻的机会。

《乡恋》虽然被禁，却在老百姓手中的盒式录音机里走红。那时李谷一参加演出，常常是不唱《乡恋》就下不了台。已经敢于表达自己心声的听众一遍遍高喊《乡恋》、《乡恋》……

1983 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面向全国观众直播春节联欢晚会。演出名单里有李谷一，但是节目单中并没有名噪一时的《乡恋》。

在许多人看来，这当然是在情理之中的。如此影响巨大、代表着主流形象的全国性的晚会，怎么可能演唱一首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的歌呢？

然而，一切大大出乎晚会总导演黄一鹤的意料：李谷一在台上一出现，观众就来电话点

播《乡恋》。

那天晚上，现场开通了四部热线电话。观众就通过这四部电话，开始影响甚至左右晚会。

电话记录员把一大堆观众点播《乡恋》的条子送到导演室，交给了黄一鹤。黄一鹤感到非常为难。面对着观众的热切要求，他却无法决定是否让李谷一唱这首歌。

当时正好广播电视系统的最高领导吴冷西部长在第一线坐镇。黄一鹤就让电话记录员把观众的电话点播记录单交给吴冷西，把球往上面踢。

吴冷西见点的是《乡恋》，摇了摇头。

没想到，打电话让李谷一唱《乡恋》的观众越来越多，同样的点播单装了一盘又一盘。

那是老百姓的意愿，他们在表达社会对文化的真正需求。

黄一鹤坐不住了，他对那端着盘子的工作人员说：这事你无论如何得跟吴部长好好说一说。

吴冷西似乎也坐不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找到黄一鹤这边来了。

没有多余的话，吴冷西说：“黄一鹤，上《乡恋》。”

可以想见，吴冷西当时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但面对观众的要求，此时的他却很明智，也顾不了太多。

吴冷西，曾长期担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务，对党的意识

形态领域工作非常熟悉，并富有创见。据说，当年调任他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时，毛泽东曾严肃地告诫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在决定让李谷一唱《乡恋》的那个晚上，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不是在吴冷西脑海里闪过呢？

社会需求的浪潮开始冲决堤坝。

在这场晚会上，李谷一应观众的掌声，一而再地唱，一人独唱了九首歌，可谓空前绝后。

《乡恋》以它在春节晚会的亮相洗刷了罪名，从此被人们当作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有了这样的背景，广东电视与香港电视的合作开始更为顺畅，更为频繁。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也为香港广播电视向广东的大举进攻埋下了伏笔。

《霍元甲》以及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花仙子》、《苦儿流浪记》等流行一时的节目都是由广东登陆的。

潮水冲刷的不仅仅是广东，它很快就在全国各地漫漶。或许还会有不少人记得 1984 年

的一个日子，准确地说，是5月6日，初夏的一个普通夜晚。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开始播映香港“亚视”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一时间万人空巷，其主题曲四处传唱。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也许，国人对大众文化的渴求也就此苏醒。

正是从《霍元甲》开始，香港电视适时地扮演了大众文化的启蒙者，激活了国人被压抑的通俗文化审美需求。从此港产剧一发而难收，成为本土电视的最大对手。

这是一个孕育着无限生机、希望，又包蕴着多少争论、危机的年代！

改革的格局已经形成，精神生活正在日益活泼。希望与不安，矛盾与生机，尝试与误判都在发展，有多少现象就有多少种说法多少种争论……纠缠着，交织着，这是怎样一番盛况！

但是，大江流日夜，逝者如斯夫！天空无论怎样扑朔迷离，道路无论怎样交错起伏，历史蹒跚着又开始顺着人心所向发展。

第二节 全方位冲击

英国传媒学家 David Morley 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一书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生活的世界逐渐形成一种‘电视地理’……其中，电子讯号的传送和分配所界定的无形网络跨越了现存的地理边界。”

如果套用“电视地理”的概念，广东与香港无疑属于同一个“电视地理”区域，而与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内地电视反而要显出几分隔阂。事实上，广东本土的人大多是听港台歌星的粤语歌和看香港电视长大的。

有一个笑话流传甚广，说的是有一次，赵忠祥和倪萍两位大腕主持人来到广州。在出租车上，我们的赵大叔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开玩笑地指着倪萍问司机：“知道她是谁吗？”

司机回头望望，摇头。

倪萍也礼尚往来地指着赵忠祥问司机：“那你知道他是谁吗？”

司机看了一眼，还是摇头。

于是倪萍感慨万分：“不认识我也就算了，连赵老师都不认识，这人得多少年不看电视呀？”

赵忠祥、倪萍，这对连续十几届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黄金搭档，在国内真可谓无人不识。然而，南来广东，竟然连见多识广的的士司机都有眼不识泰山，也难怪会令他们生出这番感慨来。

不过，在很多广东人看来，赵忠祥和倪萍会发出这种感慨，同样难以理解。

长期浸润于香港电视，有相当一部分广东人对于中央电视台其实是非常生疏。即便是深入千家万户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广东人熟悉的也未必太多。

每当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锣鼓敲打起来的时候，全国多少亿人赶紧围坐在电视机前，生怕错过这桌文化大餐中的某一道菜。赵忠祥、倪萍，还有后来的朱军、周涛等联袂登场了，他们或煽情，或调侃，或读电报，或念对联，脸上一致亮出了招牌式的微笑。但是，许多广东人此时却正在花市徜徉，逛花市才是他们热衷的过年方式，是他们真正的精神享受。

即使没有花市，老广们也未必对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感兴趣。这很难说是广东人的“觉悟”不高。要知道，我们的所谓综艺节目，在人家香港的电视台那里已经不知道玩了多久，早就花样百出。广东人对这些先睹为快，司空见惯了，而且人家讲的还是自己的母语粤语呢。

广东观众的眼睛，就像当年一律指往南边的鱼骨天线一样，捕捉着在水一方的港味电视。因了香港电视的日久浸润，广东老百姓的电视欣赏口味，已经提前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了，而对于本土电视的喜爱，却显得平淡了许多。中央电视台尚且没放在眼里，更遑论其他的省级卫视台！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电视节目所观照的，并不止于香港一隅。

凭借着敏锐的潮流嗅觉，香港的电视节目总能把最新的世界趋势传达出来。大凡国际的重要消息，都可在香港电视中得知其况，而且常常可知其详。这当然也包括对内地的一些新闻的报道，许多内地传媒难以报道或不便报道的，香港电视却大肆渲染。尽管这里头常含水分，甚至常有“作大”（粤语：“夸大其词”之意）之嫌，但是因为它是老百姓唯一的消息来源，所以总是有不少人追看。

香港市民的主体就是过去的广东人。岭南文化的平民性、市井性、感官性、享受性以及开放性等等特点，在香港那边寻到了一个最适宜的承载地。香港电视正是因应了这一社会民众基础，将这些特性发挥到极致，即使是最西化、最前卫、最时尚的内容，到了香港电视中，也常常变得异常世俗，极对市民口味。即使是电视中的广告，香港电视也做得比内地的时尚、新潮，有看头。

香港电视的这种诱惑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竞争条件，包括与广东电视在政策上的不对称，也包括了市场的不对等。境外及香港电视频道的落地广东，意味着广东的电视市场对它们的全面开放。但当时广东本土的电视却并没有因此获得相对等的市场空间，因为国家对内地广电实行的是统一的捆绑管理。

眼睁睁看着别人在自己的家门口袖舞长空，广东人却必须戴着镣铐跳舞，徒然临渊羡